

# 何去何從： 中臺梵三角關係中的人權與宗教自由

梁 潔 芬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研究中心訪問研究員)

## 摘要

鄧小平在 1979 年開放政策之初，教廷於 1987 年主動向中共提議雙方和談，意欲恢復「中梵關係」。這行動對臺灣和教廷建立的「臺梵關係」，有莫大的衝擊。因北京堅持若中梵建立外交關係，必要臺梵斷交。2018 年 9 月中梵簽訂了，有意先解決中梵談判的核心問題——指派主教一事。這「臨時協議」增加臺梵可能斷交的壓力，加上 2019 年中美爭霸的過程中，中美在貿易、科技、金融等要談的問題將包括「宗教自由」在內的「人權」問題。加上美國以宗教自由問題拉攏梵蒂岡，香港於 2019 年多個月的抗爭內有天主教會和基督教會的支持，既令北京頭痛，又使中梵關係加增變數。本文旨在討論今日的「中梵關係」和「臺梵關係」加上中美新冷戰期加入新的「人權」和「宗教自由」元素後，有何新發展。

**關鍵詞：**中臺梵關係、美國和香港因素、中梵臨時協議、宗教自由及基本人權

\* \* \*

## 壹、導言：「中梵關係」、「臺梵關係」和「中臺梵關係」

中國與梵蒂岡關係<sup>①</sup>（中梵關係）顧名思義，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說，是今日教廷期望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關係。其實「中梵關係」始自 1942 年的南京中華民國政府和教廷建立的中梵外交關係。但在 1951 年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統治大陸後，中梵關係因教廷駐華大使黎培里總主教被逐，中梵外交關係告中斷。1952 年梵蒂岡將駐華大使館遷到臺北，黎培里總主教繼續與遷臺的中華民國政府進行外交關係。但到了 1978 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計劃下，教廷當時主動向中國招手，與北京接觸和談判，意欲恢復已中斷的「中梵關係」。因此，教廷在 1952 年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外交關係，稱之為「臺梵關係」。從此雙邊的「臺梵關係」和「中梵關係」，因牽涉的問題錯綜複雜，可以演變為「中梵臺三邊關係」。

### 一、「中梵關係」和「臺梵關係」走過的路

1978 年以後，北京和梵蒂岡有意朝向藉訂立協議（Concordia），修好中國和梵蒂岡的衝突關係，於 1978 年 11 月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與馬尼拉辛海棉樞機（James Cardinal Sin）會面時，答應雙方有關官員準備文件細節，準備中國和梵蒂岡正式和談，重建中梵外交關係<sup>②</sup>。北京自 1978 年從開始中梵談判之日起，不斷要求中斷「臺梵關係」是重建中梵外交關係的先決條件，使臺灣和教廷的外交關係不斷受到長期的威脅（Leung and Wang 2016）。1978~2018 年談判斷斷續續了近四十年，沒有主要的成果，無法去解決國內天主教內部和政教關係範圍內錯綜複雜的問題。

### 二、中梵關係的基本問題：權力的衝突

數千年來中華世界，在秦漢式的政體下（即儒化法家下的威權主義下）的宗教生活，基本上為宗族與政治權力所控制，不具備自治組織和獨立權威，尤其是在

---

註① 梵蒂岡是在羅馬梵蒂岡山上面積 44 公頃（110 英畝）的城邦屬聖座的全權管轄，在 1929 年締訂的拉脫朗條約而生的。梵蒂岡是個宗教王國。由教宗管治。它是教宗聖座的屬土，也是天主教的中央行政機構，它是國際法所承認主權國。梵蒂岡包括教宗和羅馬教廷（天主教會的中央行政機構）。教宗不僅是梵蒂岡一國之君也是全球天主教的最高領袖。

註② 這是耶穌會顏哲泰神父當時陪同辛海棉樞機訪北京的神父，於 1990 年告知筆者。

近代基督教世界裡，天主教創立了發達持久的神權組織和權威，可以挑戰宗族國家的權力。為封建王權，包括天主教在內的宗教，只能為政治服務，別無他想（王飛凌、劉驥譯 2018, 141-183, 255）。依傳統中國數百年來政治角度的說法，政府與宗教團體的關係就是「權力衝突」的關係。在現代社會，天主教所蘊藏的有神論下的宗教理想主義，和中國共產黨信奉的無神論下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意識型上是互為桎梏，不能相容（Leung 1992）。中共以辯證法為基礎而訂的「宗教自由」政策，給局外人的印象是，宗教自由在中國大行其道，和西方國家沒有兩樣。但骨子裡，黨國對宗教的操控，從毛澤東時代到習近平執政，沒有稍停，但執行時管控力度的鬆緊緩急，就依政治氣候而定（Leung 2005）。例如自從習近平於 2014 開始執政，將意識型態的維穩，提升到國家安全的層次，所以執政的中共對宗教的操控，對人權和宗教操控的程度，回復毛澤東治下閉關鎖國時代<sup>③</sup>（劉慧 2014）。雖然有了協議，中梵關係應由對抗稍為轉向緩和、合作和尊重，但拆天主教堂仍在教會很活躍的陝西省出現（中央社 2019）；從 2018 年 3 月開始，網上禁售聖經，教堂裡未經政府許可、非官方出版的詩歌讀本等各種宗教讀物不能售賣，政府將宗教場所作為「掃黃打非」行動的一部分，進一步嚴控宗教活動和出版物品（古奇 2019）。最近消息傳出有些教堂將習近平畫像代替聖像。

中梵關係的衝突，除了意識型態的衝突外，還有中梵兩個主權國家的行政權力的衝突也是棘手問題。梵蒂岡談判的目的，旨在與中共建立較和諧的關係，以利大陸天主教會不受政治滋擾，而能正常運作和發展。而北京的目標最初是中斷臺梵關係，使臺灣失去唯一歐洲國家的邦交，在國際上更形孤立，有希望逼它走上兩岸談判統一之路。但多年來兩岸談判開展，但沒有梵蒂岡推波助瀾。

本文以中梵關係權力衝突的脈絡下討論，在國際政治屬現實主義的範疇，所以略略帶過這政治理論。新現實主義在國際關係中以國家的權力為考慮國際關係時的重要因素首先由 Kenneth Waltz 在 1979 年提出。新古典現實主義即體系與國家和個人層次都考量。臺灣學者明居正（2009）討論體系與國家及社會個人層次。政治學者包宗和與吳玉山套用「婚姻理論」，形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政策。這是北京與外國建立雙邊關係時，不能接受任何國家與它和臺灣建立三邊關係（包宗和 2011）<sup>④</sup>。在「婚姻理論」下中梵關係在「零和遊戲」的邏輯思維下，在外交事務

註③ 習近平當上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後，於 2014 年 5 月 6 日他推出名為《國家安全藍皮書：中國國家安全研究報告 2014》（簡稱國安藍皮書）（劉慧 2014）。

註④ 文獻方面除了包宗和與吳玉山之作品和明居正的可以作為參考。英文方面有 Wu（2005）、Oliver

上，北京的「得」是臺北的「失」，相反臺北的「得」是北京的「失」。在現實生活上，臺灣和梵蒂岡的關係在大陸的陰影下展開交往，所以臺梵關係牢固與否，很大程度看中梵關係如何發展。

自 2018 年北京的注意力在中美糾纏在貿易、金融、軍事和高科技等問題上，強調臺海兩岸關係的發展是重要因素，雖然教廷要遵守這套「婚姻理論」的政策，教廷夾在大陸與臺灣之間，滋味不是好受<sup>⑤</sup>。況且在 2019 年因中美貿易戰以來，加上香港由反對《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而引起對與北京有關的黑警暴行的抗爭，或稱抗暴行動（維基百科 2019），人權問題包括宗教問題，會提升到中美兩國談判的內容，因為美國參眾兩院將推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蘋果日報 2019），以維護香港反共抗中的全民運動，背後所保護的人權和法治（美國國會臺灣觀測站 2019）。這個中美貿易談判中所含宗教自由的人權，對中臺梵三邊關係，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梵蒂岡聲稱：它對全球天主教信徒有管理權，這管理權由北京來挑戰，後者強調國家主權的完整，故此由國家操縱教會包括政府選派主教，是理所當然。但這自選主教是偏離了「宗徒承傳」的基本教義（Leung 1992, XV）。因此中梵雙方的爭端，都有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問題的因素夾雜在內。所以「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是中梵談判上遇到兩個最棘手的難題（Leung and Wang 2016）。

## 貳、中梵恢復對話：臺梵關係備受威脅

在 1949 年政權易手時，教宗代表黎培里總主教，當西方國家的代表團紛紛撤離中國，而他獨留守南京，希望能向新執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毛澤東，呈遞國書，繼續中梵關係，但中共將黎培里總主教驅逐出境（蘇若裔 2000, 29-51），中梵的外交關係在大陸方面中斷了，南京總主教于斌在 1949 年前，已和國民政府發展了親密的關係，他成功地遊說蔣介石在臺政府，邀請被逐的教廷公使黎培里到臺灣，在臺灣重建教廷駐華大使館恢復中梵關係。於 1952 年，中梵的雙邊外交關係就建立起來（陳方中、江國雄 2003, 244-251）。而在臺北的教廷駐華大使館開始運作。

---

（2005）、McDevitt（2006）等等。

註⑤ 這是教廷駐華代表陸陸道蒙席（2008～2016）對筆者表示的。訪問日期：2015 年 9 月 3 日於臺北教廷駐華大使館。

鄧小平 1978 年的開放政策，也開放了梵蒂岡和北京對話與談判的可能性，依協議的模式去重建中梵外交關係。1981 年 2 月，東方政策之父加沙羅理樞機（A.Cardinal Casaroli）本來陪伴教宗訪問遠東，在馬尼拉這站時，他臨時改變行程，特別飛往香港，往見被囚達 22 年被釋後的廣州主教鄧以明，並在香港的記者會上，表示梵蒂岡希望和北京對話。北京政府官員只冷然的說「中國和梵蒂岡沒有邦交，中梵建交的先決條件，是切斷臺灣和梵蒂岡的外交關係」（Leung 1992, 210-212）。大凡梵蒂岡對北京有任何舉動，臺北小心觀察和分析，不敢懈怠，尤其是對北京示好的行動言論，它特別緊張，因為影響到它的外交。

臺梵關係在中國大陸陰影下生存，因為最初北京與梵蒂岡談判建交最主要目的，是割斷臺梵外交關係，使臺灣從國際社會中推到邊緣，更形孤立，最後逼使它回到兩岸統一的談判桌上，依大陸的條件而談判。因臺北自 1971 年起不能以主權國家的身分與聯合國會員國建立外交關係，或參加需要以國家名義參與的國際組織（李允中、梁潔芬 2020）。它退出聯合國就是將大量外交關係，由臺北轉移到北京現在只剩十多個，北京對臺灣在國際社會上的進迫，梵蒂岡對此沒有什麼貢獻。

從展開中梵對話和談判，經過 31 年（1987~2018），是梵蒂岡教廷首先伸出橄欖枝向中共表示願意對話，最後恢復中梵的外交關係，自始至終中共對這問題是癬疥之癢，非致命之疾，在國際關係上，不能公然拒絕梵蒂岡，因它所代表全球天主教會的最高權力的核心，它的元首，既是梵蒂岡小國（面積僅 0.44 平方公里）之君，也是全球天主教徒（13 億 1300 萬）領袖。1987 開始中共的回應是，中梵恢復外交關係條件有二：即一、切斷臺梵外交關係，二、梵蒂岡不能干涉中國內政，包括教會內政（Leung and Wang 2016）。這表示以教宗為首在梵蒂岡內的羅馬教廷對中國教會沒有統治權，斷絕了宗徒繼承權。但照梵蒂岡依天主教法典的規定不能答應，但答應互相來往對話，以了解對方，希望日後有轉圜的餘地；所以有「橋樑教會」活動，在鄧江時代，大陸要脫貧，所以國外教會以物資支援內地教會活動，在黨的控制下宗教部分復甦（Leung and Kuo 2014）。而共產黨方面亦對外宣稱，實施所謂「宗教自由政策」以監控宗教不能離開黨建構的軌道外活動，但能源源不斷的得外援對鄉村地區的脫貧，有少許幫助（Leung 2005）。所以中梵雙方官方談判在三十多年間，有幾段時期停頓了對話，但教會人士和各級官員的來往，從未間斷。到 2018 年，在梵蒂岡很大的讓步下，中梵談判有初步的成績，雙方關係希望有點突破。

## 參、今日的「中梵關係」和「臺梵關係」何去何從

2018 年 9 月 22 日中梵簽訂了有關指派主教問題的「臨時協議」。這歷史性的協議使中國政府有權指派主教，而教宗只可以接納或行使其否決權（O'Connell 2018）。這協議從宗教的角度去看，引起天主教會內很多的異議，例如陳日君樞機是最明顯的代表，他苦口婆心的不斷向教宗呼籲，若不能在中國教會內獲得宗教自由，千萬別與北京簽訂同意書（陳日君 2018）。從政治的角度去看，西方的學術界和政界，大都不贊成這個協議<sup>⑥</sup>（Ching 2016），因為自 1990 年代初，中國在國際貿易上受益很多，經濟突飛猛進之際，對國際條約的遵守觀念跟著逐漸淡薄，它以自己的意願解釋國際合約，美其名曰這是「中國社會主義的特色」。西方的政界和學界有理由相信，協議合同內容的「教宗的決定權」（veto power of the pope），將逐漸變成「教宗沒有什麼權」（no power from the pope）。

連在國策上，以利為先的川普治下美國政府，最近它的國務卿龐佩奧（Pompeo）透露，美國政府也反對這協議（O'Connell 2019）。因為中國近年在經濟崛起後，對國際條約的遵守紀錄，日見劣績，例如加入世貿組織 15 年後，仍未依約開放某些市場。在中共十九屆黨大會中習近平竟稱「中英聯合聲明」已進入歷史（即作廢）。北京以「中國特色」的路線，以偷天換日的手法，在管治香港時，將中英聯合聲明中的「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原則，20 年後變成習近平宣布的「全面管治」（BBC News 2017）。在 2020 年 5 月 28 日的全國人大會議中，同時表決「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簡稱「港版國安法」）為香港通過了〈國家安全法〉加在香港的基本法之內，使香港的「一國兩制」代之以「一國一制」（維基百科 2020; 林宸誼 2020）。所以預見中梵臨時協議中，這歷史性協議指定由中國方面選出主教後，教宗可以接納或行使其否決權。但實際上，西方國家和中國多年交往的經驗，「中國特色」的做法是，可以用似是而非的理由，任何條例都可依北京的意願解釋和實施。「港版國安法」是一個驚動全球的例子，北京可以不顧普世價值的法制觀念，而可以用強權加諸法理之上，為了要政治穩定，香港的經濟利益可退居次位。

為梵蒂岡而言，香港是全球華人教區之最重要者，其活動量是全臺灣七個教區

---

註⑥ 林和立於 2016 年 11 月 26 日在香港教區正義和平委員會主辦「中梵關係何處去」的研會中，發表〈中國宗教情勢分析〉。

之總和<sup>⑦</sup>。國際上香港是對封閉大陸信息的窗口，大陸教會的訊息也經香港傳達，香港教會占香港人口不超過 10%，但有兩名樞機主教駐在其中。香港教區的動向是大陸教會仿效的對象<sup>⑧</sup>。

回歸之初即 2013 年，筆者粗略算過 87% 的香港高級官員是天主教徒基督教徒，香港的天主教徒認為政府給予民主和法治，才能保存宗教自由，大陸對香港民主派的打壓，對香港的百般「大陸化」，在「反送中」和實施國安法的民衆與政府抗爭時，反對派著名的香港民主之父李柱銘，和唯一未被政府收編的明報老闆黎智英正在抵受政府的壓力，二人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們終於被捕，西方各界譁然。為梵蒂岡而言，一個為衆華人教會之首的香港教會，在五星旗下變為大陸衆教會之一，梵蒂岡是不願意看到的現實，所以香港是梵蒂岡考慮和大陸關係的進展時，不可以不考慮香港教會。

## 一、美國扮演的角色

2019 年中美貿易戰漸漸演變為中美漸漸步入「新冷戰」之際，美國向教廷招手，針對中國對宗教的苛政，邀請教廷參加國際宗教自由大聯盟（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Alliance），龐氏認為全球 80% 人民被剝奪宗教自由，所以他邀請教宗和美國共同推動宗教自由，在同一會議中，美國一名官員 Sam Brownback 在會後接見記者時，用強硬的言詞批評中國對宗教的逼害（O'Connell 2019）。

而中梵臨時協議的兩年期限將屆，香港和美國對北京政府管治方式的抗議，使人要問中梵關係會起什麼變數？2019 年的 9 月中國在一周內將南太平洋島國索羅門群島和吉里巴斯，從臺灣邦交國中挖走使臺灣只剩 15 邦交國（蔡孟翰 2019），梵蒂岡是其中之一，使人不禁起掛心，脆弱的臺梵關係可以保得住嗎？2019 年中華民國國慶翌日，身為教徒的陳建仁副總統，要遠赴梵蒂岡（自由時報 2019b），藉參加英國發起牛津運動的紐曼樞機（John Cardinal Henry Newman of Oxford Movement）的封聖典禮，與教廷當局談臺梵關係，冀望在中共向臺灣邦交國挖角的工程中，能保臺梵關係，若北京將臺灣唯一在歐洲的邦交國——梵蒂岡搶走，美國會如何對此作懲罰性反應？一如它對索羅門和吉里巴斯 2019 年 9 月 6 日在五天

註⑦ 這是曾駐臺灣的梵蒂岡官員的意見。筆者在 2003 年和他參與一中國問題會議時，向這位官員在澳洲雪梨作訪談（2003 年 12 月）。

註⑧ 大陸愛國會副主席劉柏年（很有權威的宗教官員，綽號是 Black Pope。他對友好抱怨：「香港只是祖國一小特區，面積小得很，為何全國的地方教會對它馬首是瞻。」）

內和臺北斷交投向北京一樣（聯合報 2019）。

國際關係上，大國雙邊關係的影響力是跨國界的，近期中美爭拗，先從貿易戰開始，似乎進入新冷戰狀態。軍事上在南海的爭拗、臺海問題、匯率的爭執，人權問題更有新冠狀肺炎引至全球性瘟疫等都擺在面前，是全球兩大意識型態的衝突：自由主義的民主政體和共產主義下獨裁政體的衝突，言論自由和宗教自由對中共的獨裁政權產生威脅，中共當局承認這些自由思想絕對不容許在中國扎根（顏涵銳譯 2020, 10）。美國以保護人權問題，向教廷招手，以保護宗教為名拉攏梵蒂岡，使中梵關係沾上什麼色彩，加上臨時協議兩年期限將屆，很值得去細緻的考慮中梵關係的未來。中共在臺灣邦交國中挖角，陳副總統匆匆赴教廷探口風（自由時報 2019a），這表示中梵和臺梵關係，在國際環境的改變，如何推展，是今日臺灣政界討論的焦點。

國內教會在協議簽訂後，國內的宗教幹部，手執「臨時協議」，要求全體司鐸登記，作為從事牧靈工作的必需條件，而在登記的文件中，聲明接受中國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原則。部分地上的司鐸對教義嚴謹遵守的都覺得不是味道，地下教會的反彈更大，請教廷定奪，於是於 2019 年 6 月 24 日以教宗的名義頒發名為〈聖座關於中國神職人員民事登記的牧靈指導〉的文件。這份短短千餘字的文件，表示教會高層了解中國教會的複雜性，並且，對於 1950 年代，推行三自運動，天主教會內視作洪水猛獸的教會「獨立」問題，教宗方濟有異常寬鬆的解釋。他說：

「中國現實的複雜性，加之在整個國家似乎不存在規範宗教事務的統一實施常規，也就特別難以對這一問題發表意見。一方面，聖座無意強迫任何人的良心。另一方面，考慮到秘密狀態的經驗並非教會生活的常規，……在中國的天主教會的『獨立』不是絕對意義上的獨立——也就是說同教宗和普世教會分離，而僅相對於政治領域而言，就像世界各地教宗和一個地方教會之間的關係或者各地方教會之間關係中所發生的一樣。」（梵蒂岡 2019）

指導文件中，詳細說明依各人良心而行的細則：

「如果一位主教或司鐸決定進行民事登記，但登記的聲明文本似乎不尊重天主教信仰時，他在簽字時以書面的形式說明，他這樣做，沒有缺少對天主教教義原則所應有的忠誠。如果無法以書面形式作出這一說明，



申請人也可以只在口表達，如果可能的話在一位證人的見證下表達。總之，建議申請人隨後向自己的教區教長書面證明其登記的意向。」（梵蒂岡 2019）

中梵雙方的信任似乎沒有因有了「協議」而有所改進，2019 年 8 月 21 日在葡萄牙花地瑪舉行的宗教問題的國際高峰會議中，北京政府嘗試對主辦單位施壓，意欲取消邀請陳日君樞機和香港民主之父李柱銘作代表的資格，因為中梵臨時協議和香港正在進行的抗議的問題，是在議程中（Carvalho 2019）。

一名多年關注中梵關係發展的教會人士，比利時籍韓德力神父透露：在 2000 年代，在北京的政壇上，中梵的外交關係，並非政治局優先處理的問題，其實北京政壇高層人士，並非全體同意與梵蒂岡對話<sup>⑨</sup>。2018 年以來，習近平在外交上，尤其是中美貿易問題，香港的抗爭和內部派系鬥爭中，和經濟衰退的內外交煎中，原本無心處理如癬疥之患般，無傷大雅的中梵關係問題。但在中美關係上，宗教和人權問題，成為中美談判時一塊籌碼，本來今次提上的宗教問題，主要是針對將數百萬新疆信奉穆斯林的維吾爾族人，強迫他們漢化和宗教迫害手段有關。但中美的爭雄中，人權問題是美國對中國施壓的手段，但美國於 2018 年 10 月 4 日，藉彭斯副總統的演講，全面地評論中國壓迫各項宗教的措施：

「興起新的迫害基督徒、佛教和回教徒的浪潮，……上月全國最大的地下教會被迫關閉，十字架被拆除，聖經被焚毀，信徒被關禁，為中國基督徒情景悲涼……」（VOA News 2018）

## 二、香港教會和香港「反送中」條例的抗爭

2018 年 9 月，中梵簽署主教任命協議後，教廷似乎對北京做出許多妥協和讓步，避免觸怒北京。2019 年初香港主教楊鳴章病逝時，教廷並未按照慣例將支持民主和正義，受青年擁戴的輔理主教夏志誠繼位，反而破例指派退休樞機主教湯漢回鍋暫代（蘋果新聞 2019）。當時輿論解讀為，教廷怕得罪北京，因此不任命政治立場傾向民主派的夏志誠擔任香港教區主教，而選擇了支持中梵對話的湯漢。

---

註⑨ 這是韓得力神父與中國有關宗教官員接觸後，所得的資訊。事後在很多公開和私人場合上，他透露這訊息。

香港的〈逃犯條例〉又名〈反送中條例〉引起民衆抗爭，由 2019 年 6 月開始到截稿之日（2020 年 1 月 1 日），有一百萬人和二百萬人上街的紀錄，民衆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表達他們對特區政府取回在「中英聯合聲明」中「一國兩制」下的自由和法治，而特區政府的警察以殘暴手法對付，這個抗爭得西方民主國家的支持。陳日君樞機接受 BBC 訪問時，他直斥天主教徒特區首長林鄭月娥以警察暴力對待示威者和普通市民的不是，她不依天主教的社會訓導而行，他幽默的評擊她說：「特首以爲她的謀略比教會的訓導更高一籌」（Roberts and Teague 2019）。

天主教會的政治參與分開地方的層次和國際的層次兩種。在地方的層次上，香港教區輔理主教夏志誠多次走上前線，帶領年輕的抗爭者一同祈禱。更特別的是，不少基督徒示威者在行動中高唱聖詩《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唱哈利路亞讚美主》），感染了非教徒一起大合唱，發揮了安定人心、撫慰情緒的作用（阿波羅新聞網 2019）。在遊行途徑中的各間天主教堂，全日開放給參與遊行作休息和補給的地方。5 月 17 日，宗座署理湯漢樞機向全港堂區下達指示，呼籲教友爲香港因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引致的恐慌和撕裂，以及市民的安全和自由祈禱。

第 11 屆天主教國際青年論壇 19 日到 22 日在梵蒂岡舉行，全球共有 250 位青年代表與會。教廷「平信徒、家庭、生命部部長」法瑞爾樞機主教（Kevin Farrell）22 日在聖伯多祿大教堂，替國際青年論壇與會者主持彌撒，談到青年信徒應有的生活態度和使命時，強調年輕人一定要醒悟，要起來做出一些行動。法瑞爾樞機除讚揚香港學生站起來爲公義抗爭，也提到 1989 年天安門事件中，以身體擋著坦克前行、保護學生的勇士，讓與會的香港學生聽了感到十分驚喜和感動（阿波羅新聞網 2019）。

此次香港事件中，初期是教廷代理湯漢保持緘默，但梵蒂岡一反常態，它的新聞官網於 6 月 13 日以罕見高規格的兩篇中英文專訪，報導了湯漢樞機在羅馬譴責暴力的聲明，呼籲香港政府尊重人民表達意見的自由。湯漢返回香港後在 6 月 19 日更是直接表態，支持抗爭的群衆，要求港府撤回〈逃犯條例〉法案（阿波羅新聞網 2019）。在 10 月 12 日在香港電臺《香港家書》中，呼籲執法者以良知執法，重建官民互信（公教報 2019, 10）。湯漢樞機態度的轉變是照梵蒂岡的意願而行，由親中而轉向支持與北京對立的香港反抗者。使人憶惻梵蒂岡對大陸態度有微妙的轉變（阿波羅新聞網 2019）。對談判中的「中梵關係」有關的宗教自由，有更清晰一點的看法。

中共的〈人民網〉最近對香港近六個月的長期抗爭，除加強暴力鎮壓的力度

外，對天主教會和基督教會開放教堂，兩教的牧者以行動支持抗爭者之舉，開始口誅筆伐，北京認定基督宗教是幕後支持港人抗爭的力量，提議向教會開刀即文中最後提議所謂「刮骨療毒」了（人民網 2019）。在香港事件對天主教會動的敵意，反映出縱使中梵已簽了「臨時協議」，教廷對北京作了許多妥協，2019 年初香港的主教任命，也一度被視為談判桌上的籌碼，但北京在維穩政策下，收緊對宗教控制的氣氛中，在香港抗爭事件上，對教會敵意加深，2019 年陳日君樞機到捷克巴格達參加國際會議主題是「恢復 1989 年之承諾」陳樞機被邀在此國際民主復興聯盟中發言，專談香港人數月來為自由，法治和民主的抗爭，並呼籲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sup>⑩</sup>。

香港的抗爭，在國際政治上有特殊意義，香港是世界上有史以來，從西方殖民地政府交回共產獨裁政權的唯一地方，在道義上有問題。香港回歸後屬中國領土，又不完全受中國統治，現在北京利用「黑警」踐踏人權，拘留了七千多青年，梵蒂岡一言不發，但准許本地神職支持抗議活動。香港的抗爭得西方自由世界道義上的支持，這個抗爭梵蒂岡似乎想置身事外，這種態度是否在日後中梵談判增加變數？

始自去年（2019）中共開宗明義的定下詳細規條，要求宗教（包括天主教）要跟隨司銀鐸有行動手冊詳細規定行事照黨的路線，要有中國特色（Kuo 2019）。中共於 2019 年 11 月底一個宗教會議中由汪洋聲明，中共要重新編譯《聖經》和《可蘭經》加上社會特色的中國體系，以符合社會主義價值觀，將信仰「中國化」，其實是將習近平思想變成教義，強化對宗教的控制到極致的地步。請問「臨時協議」有利教會嗎？這敵意態度有利中梵談判嗎？（RFA 自由亞洲粵語 2019）

中共對索羅門和吉里巴斯 2019 年 9 月 6 日在五天內和臺北斷交投向北京，也遭美國的批評（VOA News 2018），這兩小國面積雖小，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非常微弱，但位於加勒比海近美國的南大門，所以美國不能等閒視之。近年自中美角力後，美國對臺灣的重視加強，可在美國在臺的駐軍，美國在臺協會（AIT）的能量升級，加強與臺的軍事合作，推出臺北法案等等，顯示出來，使臺灣在中美在亞洲爭雄中，成為中美必爭的一顆重要棋子，美國對中共切斷臺梵關係會坐視不管嗎？

美國方面當它與中共步入全方位冷戰之際，於 6 月 2 日，總統發出「促進國際宗教自由的行政命令」，規劃和實施國際宗教自由時，優先考慮國際宗教自由，美國的外交政策，以及國務院和美國國際開發署的外交援助計劃（The White House 2020）。在中美關係緊張到劍拔弩張之際，這有關宗教自由政策多多少少都是劍

---

註<sup>⑩</sup> Dr. Kenneth Chen 參加 2019 年 12 月 18 日這個會議後告知筆者的消息。

指中國。中美在意識型態之爭的主調下，展開各種鬥爭之中，美國新加上關注宗教自由問題，雖然主要是指觸目的新疆對穆斯林信徒不人道的「漢化」，但對天主教的壓迫未稍放鬆，梵蒂岡在在新冷戰前，全球國際秩序大變之際，仍站在自由世界的對立面，與不尊重宗教自由的中國繼續有幻想嗎？

## 肆、總結和展望

雖然中梵在 2018 年簽訂兩年為期的「臨時協議」，又聞教廷當美方在國際上圍堵北京一事上，不選站在美國那邊，要續簽協議的續約。這協議是談判先決條件，簽訂後才開始談判其他問題，但如今仍未聽到有談判成果，先是中國宗教的操控空前收緊，可以預期中梵談判在收緊的宗教氣氛下，缺乏互諒互讓的精神，沒有太大的成果，加上美國和香港因素，使談判有雪上加霜的勢態。若近日在 2019 年底爆發的武漢肺炎（新冠狀病毒 COVID-19），因北京隱瞞疫情和延遲通告，而釀成全球瘟疫的大災難，使中國在歐美各國間，是十手所指的對象，它更形孤立或被稱為流氓政權。而全球疫症完結後，全球的國際政治對中共的好感將會大倒退，國際關係的陣形將會發生大改變，跟著中梵關係將有微妙的變化，中梵談判的變數大增，難有太大進展。所以臺梵關係可以跟著前輩開了的路一直向前走去，繼續發展宗教、文化、社會、和教育的交流，以擴大臺灣在國際社會上的知名度，臺梵關係可在短期內得保安全。

\* \* \*

（收件：109 年 6 月 9 日，接受：109 年 10 月 14 日）